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文史参考资料汇编

· 第6辑 ·

民盟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小组编

我的自传

张国藩

..... (1)

李叔同年谱 (征求意见稿)

朱经畬

..... (11)

追忆先父李叔同事迹片断

李 端

..... (22)

袁世凯与北洋军阀集团

徐景星

..... (30)

《北洋军阀史稿》讨论会纪要

..... (53)

附：《北洋军阀史略》日译本绪言（摘要）

250.6
3
:6

一九八三年五月



B

087.035

我的自传

张国藩

一、简史

我的曾祖父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原住湖北安陆县北乡大花店张家湾，因生活困难，过继到附近的另一姓张的人家（与曾祖父本不同宗）为嗣子。过了一些年头，待祖父去世时，原继承的十多亩土地又卖完了。祖父^①长大了，就又携带着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搬到榔林岗张家湾（此张姓与曾祖父的继父为同宗），佃种大地主（拥田一千五百多亩）张寿峰之田，藉以谋生。我的父亲就是我祖父最小的儿子。

初搬到这里，祖父因为孩子又多又小，每年打一点粮食，除了交地租以外，所剩无几，全家生活非常困苦。我小的时候，常听到伯父、父亲、姑母等谈他们小时候与生活作斗争的故事。姑母说她六岁就学纺线，每天能纺四两；伯父说他们如何领着我的父亲到地主门口讨饭，看见地主的狗钵里的饭又白又热，就乘人不见的时候，把狗打跑，把狗钵里的饭倒在自己的篓内。这些故事，到现在还很深刻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待伯父^②和父亲长大，生活就好一些了。二伯父（大伯父早死）和四伯父学木匠，三伯父到城里知县衙门当学徒，父亲在农闲的时候念书，农忙的时候就在家帮忙。这样，每年不但够吃够用，还有一点富余。父亲也要着媳妇了。

但是这种情况就为万恶的地主所不容。张寿峰看见他的佃户搞得比好过一些了，就说这是由于他的田好，能多出粮食，硬要加租。加了一次不算，还要加第二次。伯父和父亲拒绝了。地主说祖父是葬在他的山上，硬要伯父迁坟。伯父等认为坟址是曾出了三石谷的代价买的，又拒绝搬迁。地主认为这样的佃户太可恶，就在县里控告伯父“霸占坟山，拒不交租”。幸有三伯父在县衙门当学徒，托人说了个情，给了地主几石谷子，退佃搬家了事，伯父等才未被关在监牢里，逃脱了地主的网罗。

退了张寿峰的田，父亲和伯父就又搬回老家——大花店张家湾来了。先是借了人家的几间茅棚居住，随后就卖了几亩田和一块山，在山边盖了几间房子，二伯父、四伯父和父亲的全家就都住到这几间他们亲手所盖的房子里。

在这儿，二伯父和四伯父继续作木匠，父亲在农闲的时候来往湖北、河南的边境，贩卖牲畜赚几个钱。这样家里的生活逐渐又好转，到我出世的时候（1905年），家里将近有四石田（约合二十亩），是一个中农的家庭。

这种情形又为同族的地主所嫉。有一块山地原系我们的祖业，曾祖父离开的时候就

①祖父名张益。

②二伯父名廷发，三伯父廷润，四伯父廷秀，父亲廷祥，别号聆亭。

把这块山地交给同族的人代管。伯父和父亲现在回到老家就要把这块山地收回，族人不肯，并唆使二流子张省与我家取闹，把父亲从河南带回的桃苗一千多株（栽在山下，已要开花结果的时候），悉数砍掉，因此父亲与张省又在县里打官司。虽然这块山判归我父亲所有，而家中却用了不少的钱，因此情况就不好了。

我父亲的孩子是比较多的，一共有六个儿子和五个女儿。这六个儿子当中，除大哥活到六十岁才去世外，二哥、三哥都是在二十岁左右去世的，另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都是在十岁左右去世的。五个女儿当中有两个早夭，其他三个都出嫁了。这样一个孩子多，而又穷困的家庭，不但加重父母的负担，也使父母感到悲痛。母亲因为孩子多，操劳过度，在我不到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常常在外面不大管我，照顾我的生活就由年轻的哥嫂和姐姐负责，他们对孩子冷落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多苦多难的家庭生长起来的。我以后的思想和性情都与我家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从前面的叙述看，可见我伯父和父亲的性格是顽强的，敢与地主作斗争，敢与二流子作斗争。他们当然以此自豪，茶余饭后就常向孩子们吹嘘他们的本领。说他们如何不畏强权，如何能“白手起家”，盖房置地。他们经常教导我们孩子们说，一个人要在世界上生存，只有靠自己的本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他的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爷有不如娘有，娘有不如自己有”等这一类的教导，就是我以后个人主义思想的基础。

父亲和伯父等认为他们有办法，能“从无到有”，混得不错，就自高自大起来，左右四邻，没有人是他们看得上眼的，因此就严重地脱离群众，前面所说的与族人张省的争吵也与父亲的自高自大是有直接关系的。父亲这样的作风，以及我小时候就丧母，失去家庭温暖，就成为我后来长期性情孤僻、不愿与群众来往的根源。

伯父和父亲所时刻不忘的，就是如何能拿地主张寿峰的后代出一口气，如何能拿二流子张省出一口气。但是他们无论怎样有本领，总不过还是个中农，年纪也越来越老，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了，就把这种愿望寄托在他们的后辈，特别是我的身上。

我十岁入私塾读书，三年念完了《四书》《五经》之类的书，“初通文墨”，成绩很不错，二伯父就和父亲商量，把我送到城里进学堂。那时安陆县城里，有三所学堂：一所小学，一个初中是县立的，还有一所崇文小学是英国循道会办的。父亲打听的结果，认为前两所学堂学习秩序很坏，白花钱，毕业以后学生还是回家吃饭；崇文学校秩序好，毕业以后可升武昌博文学堂。博文学堂教的主要是英文算学，学了出来不是邮政局的局长，就是海关的监察长，每月薪水至少有六、七十块钱。这样父亲就送我进了这个崇文学堂，也就是我长期与教会学校接触的开始。

在崇文学堂，除遵照父亲的教导，起早睡晚，艰苦攻读外，没有什么多的事可记。只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父亲送我上学的目的和情况，可在此略为提及。第一，关于我的年龄问题。因为要想入博文，年龄不能超过十五岁，若是在崇文小学住三年，我的年龄就会超过了，父亲就把我的实际年龄改为虚龄（中国算法），少报了两岁。第二，就是我到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叫我加入基督教，以便作为将来我入博文中学的有利条件。虽

然我在后来曾否认过我是基督教徒，中学毕业以后在思想上不相信宗教，但在小的时候，是曾有这样一段经过的。

我在崇文小学毕业后，考了个最优秀，减费升入博文中学。这个学校也是英国循道教会办的，学费本来每年要一百二十块钱，我减费后每年只缴四十块钱。但就是每年四十块钱的支出，对父亲也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每年的学费常是东拼西凑，主要是靠舅父和两个姐夫家（他们是富农和小地主的成份）的帮助，所以我家里虽然不是地主，但我上学之成为可能，与地主的剥削是有关系的。

“博文”完全是英国买办式的学校，专注重英文算学，高年级的课本都是英文的。初中读一点中国史中国地理以后，到高中就学英国历史和英国地理，大半由英国人直接讲授。初到这个学校里，我当然是有什么就念什么，只求考试的分数好，不问内容如何。待进到高中的时候，我的思想就比较开展，除不放松课堂的功课外，还阅读了不少的杂书，如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其中尤其喜欢哲学，很欣赏丁文江与张君勱等关于“玄学论战”的文章。我对哲学的兴趣到中学毕业（1925年）的时候达到顶点，我那时立志要进大学专门学哲学去。这个幻想当然无法实现，因为我的命运是掌握在别人手里。

我毕业后，父亲希望我进海关，办学校人的意图也希望我走这条路（因为那时中国海关是由美国所控制的），但我考试结果，因为眼睛近视未被录取，使他们失望。学校的校长丁克生（英人）看我成绩不错，并且总是一味地念书，没有其他的想头，并且

“还是一个基督教徒”，就决定要“帮助”我升大学，但是要签订合同，规定两个条件：一，到上海沪江大学学有关物理、数学、化学的课程，学完以后再回博文当教员。二，在大学所用之款，俟回来任教时分期扣还。这两个条件，我都欣然地接受了。但家庭因我上中学借贷很多，现在不能挣钱，又要升学，全家都反对。商议的结果，我缓一年升学，先在“母校”教一年书，把债务还清了再到大学去。

当我离开中学到大学的时候，满脑子是“崇英”的思想：英国制度好，英国民主，英国有不成文宪法，英国人有绅士气味，英国教会在中国办学校是做好事。我那时虽已不怎么信宗教，但对教会的存在却认为有一定的需要。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只有彻底的‘哲人’，才不需要宗教”。但世界上有多少“哲人”呢？我那时对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教的侵略意图，和它在中国所办的学校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干部学校”的本质，是全没想到的。

沪江大学是美帝国主义在上海办的一所高等学校。我初到这个学校时看见它房子不错，位临浦江边，风景又美，就觉得很满意。每天课内课外，还是死啃书本，星期天也很少出校门。在第一年，我喜欢哲学的脾气还未改，虽然课内所学主要是物理、数学、化学之类，在课外还是看一些哲学之类的书籍。由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又引导着我看了一些考古的书籍，如《国故论衡》、《董东璧遗书》等。这样混了一年到暑假，忽然觉得哲学一类的东西争来争去，无补实际，无益于国计民生（我那时就能够想到国计民生，可说是大革命对我的影响），就决然放弃看哲学和考古一类的书，认为中国是“以农立国”，就又打算学农。一面与博文的校长商议让我改行，一面就自己把图书馆

里关于农业的有数的几本书借来研究。我的请求当然不为我的“条约主”所接受，我只能垂头丧气地死心塌地念我的数学、物理。

我进大学的时候还是大革命开始的一年，但是我那时对革命完全没有认识。以为中国内战太多了，这又是一次内战。以后“宁汉分裂”，蒋介石在上海以及其他各处大肆屠杀青年，作威作福，我就很讨厌他（那时一般学生崇拜他的不少），认为他“不学无术、无端跋扈”，也是吴佩孚、张宗昌军阀之流。我也讨厌国民党员，他们在学校里不念书，终日无所事事，一点小事来了，就是开会发宣言，事情还是让别人作，我认为这是最坏的作风。对共产党则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接触到一个共产党员，只听到他们在两湖发动反封建斗争的一些传闻。无论如何我只是埋头在书本里，“不问政治”，专心想做一个个学问家。并且认为政治是肮脏的，从此立志“不作官”。这个念头直到解放以后还曾坚持过。

总结在这所美帝国主义“高等学府”四年磨炼的结果，我在个人主义的道路上更向前迈进了一步，资产阶级的“单纯技术观点”、“单纯学术观点”，更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了。

一九三〇年大学毕业，按照契约回到“母校”博文任教。过了一年，“侥幸”考取湖北省官费留学美国，去学水利工程。

我去美国的这一年正是日寇侵占东北和湖北省遭大水灾的一年。当时情况下的离家去国，也难免有不少的感触。在上海上船的时候曾作了一首感慨诗，其中有“三城浸沿海，楼阁满虾鱼。东北进强虏，边疆无人戍。男儿欲何为，负籍学大禹”等句，以立志学大禹治水，来为自己在此时出国作解释。但后来证明，这个志愿是不够坚定的。在美国虽然学了水利工程，并取得了“博士”头衔，但在学的时候就很不老实。我一方面学水利，一方面又学物理，并且在水利方面，特别感兴趣的是它的理论部分——流体力学。由于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流体力学方面，就不得不学一些空气动力学与航空学。这就是我后来为什么能当十多年航空教授的缘故。这也表示在那时的反动政权下，办教育以至派遣留学生完全是装门面，是漫无计划的。学生到了外国，学习情况如何，生活情况如何，再也没有人过问了。“学成归国”之后，我照例到政府部门报到。那时湖北省政府主席是张群，我向他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分配工作，好久没有得到下文，我就决定去北洋工学院教书去了，此是后话。

在美国三年多的时间里，埋头学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所谓技术，结果是使我与祖国的实际脱离得更远。但有三次经历，我后来认为是美帝国主义给我的最大“教育”。它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我是一个中国人，使我更痛恶当时反动的统治。（可惜我没有通过这些经历，更早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

在美国一上岸就感到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的歧视。上岸时海关检查，无论中国人所乘的是几等舱，一律排在最后，盘查中国人如同审问囚犯一样。这还不算，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和另一位中国同学（范治纶，在唐山铁道学院任教授）从西部乘火车抵美国中部——以匪徒最多出名的芝加哥城。到车站来接我们的有我大学的老师涂羽卿先生，他那时在芝加哥大学上学。我们一下车，就有三名便衣警察，不由分说地把

我们三人拥到一辆汽车里，直将我们送到一所警察局。在局里他们简单地问了几句，看了我的护照，就把我们关在一个监牢里。从上午九点一直到下午八点，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其中只教涂先生出去问了一次。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才知道是抓错了人；据他们说，与我们同船来的有两个中国人没有护照，上岸了，他们认为老范和我就是那两个人。但是我们是持有护照的，护照上面有像片，这些事实，那凶而且蠢的警察官是没有考虑或者故意不加考虑的。欺侮了几个中国人又算什么呢！

从监牢出来我们当然都非常愤慨，认为这不只是对我们的侮辱，而是对中国的侮辱，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就一直跑去找当时领事馆负责人，一位姓王的，他是王正廷的侄儿。我们把这段受辱的遭遇向他说了一遍，要他向芝加哥警察局提出抗议，要求道歉赔偿损失。他听了以后，不慌不忙地说：“便衣警察捉你们的时候，拿着牌子没有？”我们说没有看见什么牌子。他说：“若是没有牌子，你们可以用手抡打他们！”天哪！我们初到美国，哪知道牌子不牌子的规矩，就是知道，我们又从哪儿预备着手枪呢？！他这几句话问得我们啼笑皆非！我们所希望的抗议当然是过奢了！这是我一到美国所受的第一个有价值的“教育”。

中国人和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一向是受欺侮和被轻视的，特别是在“九·一八”后更厉害。有一次一位美国教授和我谈到中国的事情，他很严肃地问我，中国士兵会不会放枪。他说中国士兵若是会放枪，为什么在东北没有抵抗就让日寇占领了！他这样问得我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拱手送掉东北是蒋介石的主意，不是中国士兵的过错。但这些话，让这一位轻视中国人的教授听起来又有什么用呢？这是我在美国第二次受到最有价值的“教育”。可惜这位“幽默”的教授现在已不在人世了，不然，他的儿子或者是他朋友的儿子，将会告诉他中国人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会不会放枪。

我在美国得到第三次值得记忆的“教育”，是一位商人老太婆给我的。一九三三年夏，我们有四个人到美国西部去旅行，有两个中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菲律宾人。我们到了加利福尼亚城，有一天在街上踟蹰的时候，看见一张鲜明的广告，上面写着“欢迎游客前往参观加城附近八大名胜，备有汽车和午餐，概不收费”。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参观，有这样好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第二天一清早六点钟，我们就跑到招待站等着。七点来钟来了一位市俗气的老太婆，她看见我们黄皮色的三个人就问我们是哪一国的人，我们说两个中国人一个菲律宾人。她听后就不愉快地说：“对不起，中国人我们不想招待”。我们两个人听了就很愕然，我向她说广告上面说招待游客，没有说中国人不中国人啦？她说：“这是我们的规矩，没有办法”。我们感到争起来更惹得没趣，就回到旅馆，在归途中两人泪向心里流，感到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已落到如此地步，连菲律宾人也不如！我回到旅馆睡了一天，咬牙立志，回国后一定要好好地搞。待晚上那两位同伴回来了，问个究竟，才知道那个招待游览的勾当是美国一家地皮公司搞的，完全不是什么参观名胜，而是到郊外看地皮。因为按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中国人不许在那个州买地皮，那个老太婆看招待我们中国人无图利的希望，就不让我们参加。

在美国三年多的时间内，所受的欺侮和凌辱当然不只这三次，但是这三次是使我感痛最深的。我亲身尝到美帝国主义的警察、教授以至资本家的代理人老太婆都可以随便

欺侮中国人的味道。这就是我以后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腐化和无能，以及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中倡导拒绝所谓“美援”、“美国救济”的感性基础。

一九三五年回国后，一方面因为我所学的是比较理论的东西，一方面也因为湖北省政府不欢迎我到湖北水利部门工作，我就到北洋工学院教书。这种教书生活从北洋起，历经上海沪江大学、广州岭南大学、陕西西北工学院，胜利后回到北洋大学直到解放。

在这十四年的教书生活中，我曾经认为我是很努力地工作的。教书比较负责（当然也就比较认真地传播了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教书以外还作了研究工作，编写了三本书和完成了六、七篇论文。好多的教授教书以外就打麻将，我可不干这个，我读书，我作研究工作！我曾认为我是尽了我作教授的责任。我没有想到我是在认真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用一个所谓“学术”的墙把我与祖国广大劳动人民隔绝起来。

心里虽然恨蒋介石和他的反动统治，但是没有坚决地、彻底地投到革命阵营里来。自己虽作了一些反蒋的活动，例如在“一二·九”前后虽参加过“救国会”的活动；在陕南曾鼓励了一些进步教师和同学，并且曾设法使他们免于迫害（如孙家驹、殷开泰、程育等）；曾参加计划和发起“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进步组织；抵津后曾与地下工作人员（李峰等）联系，领导过北洋大学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美扶日”，“拒绝美援”，“反南迁”等斗争。但是这些活动都是业余式的。我的内心还是认为学术研究比政治活动更重要。我认为有的人可以专门去革命，有的人则应该专门研究学问。象我这样一个人应该发挥其特长，只有在不妨碍学问的研究时，来参加一点儿活动，骂骂蒋介石是可以的，若完全放弃学术工作来做打倒蒋介石的工作，未免牺牲太大。蒋介石打倒了，新的政权还是要有学问和懂科学技术的人呀，那时没有人搞学问了怎么办？这就是我那时把我的个人主义隐藏在研究学问的招牌下的糊涂思想。

在这十几年的教书生活中，因为我主要是在埋头教书和搞学问，社会的关系是比较简单的。在进步方面：除前面所谈李峰、孙家驹等人外，还有我的大、中学同学涂长望同志（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气象局局长），他是我最知己的朋友，我们的所有政治活动都是彼此知道的。在另一方面：有李书田^①和赖琏^②。与李书田仅是在西北工学院和北洋大学的同事关系，我们平时从来不谈政治问题，只是快临解放时，在关于学校南迁的问题上，我与他针锋相对地斗争过一次，结果他失败了。赖琏也是西北工学院的同事。他常和我谈政治问题，并且想拉我入国民党。但是因为他无法掩盖国民党贪污、腐化和无能的事实，他就无法改变我对国民党的厌恶，因而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我也曾劝他专门办教育，放弃搞国民党的工作，也没有为他接受。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他离开西北工学院往重庆，也就是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候，他告诉了我要跟着国民党走的哲学。他说他的人生哲学是“有权力支配人”（也就是骑在人的头上），唯其一般国民党员的无能，才能表现他的有能，使他能达到他的目的。我回答说：“我的哲学是有权力

①李书田为西北工学院筹备会主委，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解放前天津工部局的委员。

②赖琏为西北工学院院长，为二陈派的著名骨干分子。

支配自然。”我们两个人的哲学不同，只好分道扬镳了。到一九四六年我路过南京时，他听说我的思想越来越左，就又找到我谈了半天，想说服我，我也努力说服他。他唯一的说词就是“国民党虽然不好，共产党也未见得好。”我回答说：“国民党的不好是肯定的，共产党的好与不好却还待证，那末，好的希望至少还有一半！”我那时没有掌握更充足的事实和理论来回答得更好一些。从这次争辩以后，我们就完全断绝关系了。

以上就是我的简单的历史。我只把解放前与我的思想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历史背景约略地写出来了，其他的一般性的生活就没有提及。

二、我的几项主要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及其批判

1. 我对封建地主、蒋政权及帝国主义的认识

我小的时候认为地主就是有钱的人，“有钱就有势”，父亲这样教导着我，我也这样想。我恨地主张寿峰的一家，因为它曾欺侮了我的伯父和父亲；也恨我们下湾地主的儿子张昆生，因为他带头领导着一群小孩子欺侮我。至于其他的地主怎样欺侮旁人，我就不管了。为使自己免于被欺侮，我接受了父亲的教导，好好念书，以后能挣钱，“有钱就有势”，就沒有人敢欺侮咱们了。那就是说要能反对某某地主，就除非自己也变成地主才成。

我到中学以后，个人逐渐走上了“学术”的道路，认为地主有钱无名，不知上下古今，是庸俗的一群。我就把做地主的梦逐渐淡忘了。

认识地主不仅是庸俗的一群，而是可耻的一个剥削阶级，“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是只有在解放后才得到的。解放以后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学习了历史唯物论，才知道从阶级观点来看所有的地主。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参加了四川的土地改革斗争，亲身访问了三百多家贫苦农民，看他们的遭遇较我伯父和父亲的遭遇有过之而无不及；看到四川地主勾结军阀、土匪、官僚、恶霸残酷压榨农民的事实，才认识到前面所引的刘少奇副主席的话是完全正确的。这时我才从思想上痛恨封建地主这整个阶级。

我起先讨厌蒋介石和国民党，因为他们贪污、不作正事。到美国后因遇事受美国人欺侮，就开始痛恨这个腐化、无能的统治集团。但我那时还认为国民党的腐化还只是少数品质恶劣的一些党棍的责任。要改正这种局面，实行一种“好人核心”政治就行。以为在当时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若有三个到十五个有能力、有办法、不要钱的“好人”出来作为“核心”，国民党的政治是可以搞好的。待后来见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在抗日期间，把装备最好的胡宗南军队留在后方，准备内战；而胜利后又把接收工作搞得一塌糊涂，并又破坏旧政协和发动内战等罪恶事实，才认为这个反动集团非打倒不可，自己才正式参加一些倒蒋的活动。

从阶级观点认识蒋介石反动派的本质是在解放以后，通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才逐渐明确起来。才知道它不光是少数品质恶劣的党棍的问题，甚至不完全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而是它整个代表了中间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在华的势

力问题。要消灭中国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把帝国主义从中国的国土上赶出去，非打倒这个万恶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不可。这才使我从思想上根绝了对这个反动统治的任何可能的幻想。

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我开始也是比较肤浅的。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旁的国家，是一些野心政客和它的大资本家的事，教会和其他的学术机关与它的侵略行径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恨英美军队和商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但是对英美教会和它在中国办的学校则没有什么恶感。

解放以后，学习《帝国主义论》，逐渐能从阶级的本质和它的经济制度来看帝国主义，才认识到：我过去认为教会学校和它的学术机关与帝国主义无关，正是上了帝国主义的圈套。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干部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海关、邮政和洋行的买办人才，过去不正是为帝国主义服务吗？这才对我过去长期在教会学校念书，并曾在教会学校任教的历史，进一步有了正确的认识。

2. 个人主义思想的转变

我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我的教书生活，都是培养我个人主义的温床。伯父和父亲都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靠得住，所以他们一向给我的教育就是“爷有不如娘有，娘有不如自己有”的格言，要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私塾的老师也是教我“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类的话。教会学校除灌输一些奴化教育外，特别显著的就是培养学生的超政治、超阶级、甚至超社会的个人主义的观点。我在沪江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了陶知行的一首格言：“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去干，靠人、靠天、靠祖先都不是好汉。”我认为很有道理，自己就是遵照这个格言行事的。

我选定了学校的教书生活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教书生活比较最自由，与人的关系最少，最能显出个人的本领，研究一点学问还可以显得清高。我的个人主义思想使我选定了这种职业，而这种职业也进一步地培养了我的个人主义思想。

解放初期，我常听到集体主义的宣传，我内心就有些抵触。认为集体的基础还是个人，只有个人好了，集体才能好。这当然是超社会的想法^①，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后来亲身受到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的教育，看到每一运动的胜利都是群众的力量，集体的力量，主要不是个人主义力量推动了集体，倒是集体的力量推动了个人，改造了个人。这样我的个人主义思想才一步一步地消失下去，开始感觉到放弃自我，为人民工作，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工作，比为个人工作，为个人的名利工作，真是要愉快得多。解放初期，当黄松龄部长要我担负北洋大学和教育局的行政工作时，我是勉强应允的，但内心总念念不忘我的“学术工作”。直到“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经过几昼夜的斗争，才最后决定，以后一定要服从组织的调遣，毫不考虑个人；并在群众面前作了检讨，提出了保证。从此以后，我的精神就非常

^①在集体主义下，个人的努力还是重要的，但它的努力不是为个人而是为整个集体。

愉快，并立志要争取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士。

3. 我的世界观

我的个人主义思想，虽然曾是我接受马列主义阶级观点的障碍，但是通过解放后的学习，特别是几个大的运动所给我的教育，这个障碍是清除了。我不但承认社会主义的阶级性，并且深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但是我对马列主义的唯物观点就比较难以接受，有不少怀疑的地方。我上面曾说过我过去是喜欢哲学的。我跟很多资产阶级的物理学者一样，是走的二元论、唯心的道路。认为客观虽是存在的，但其“自体”是不可知的。人的认识是客观与主观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这个疑团，我长久思索，未能解开。直到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后，我花了四个来月的时间，重读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以及学习《译丛》上一些有关唯物论理文章，再结合我的科学知识，反复思考，才省悟到二元论的不可知论是错误的。人的认识固然要借助于主观的观察，这不等于是说认识的结果一定要有主观的成分在内。在物的学中我们知道有的量是随坐标改变的，有的量是不随坐标改变的。坐标的改变就等于观察方法的改变。只要我们所认识的是客观存在的本质，是各方面观察结果推断的总和，它就是脱离人的认识而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认识一个桌子，除看它的形状、颜色、大小外，还可称它的重量和试它的坚实性等等，才能判断一个桌子是木制的，不是纸做的。若单凭颜色判断，则色盲的人与正常的人的认识当然有所不同，但若把所有可用的方法都结合起来，则“物自体”是可以认识的，而不为人的认识方法所改变的。这个事实可以从工业制造的实践中与科学预见的推证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若人的认识一定含有主观的成分在内，则工业上新的制造和科学上的推理之获得验证，是不可能的（最多也是偶然的事情）。其他的论证我就不谈了。足见二元论的唯心论是资产阶级的哲学，目的在想引出一个精神世界，维护上帝的地位。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旨，资本家的存在也是上帝的意旨。工人阶级当然不能革命了！我虽然好久以前就不信神，但却为二元论迷糊了很久。

4. 我对党的认识

解放以前，虽然我一向是同情共产党，但我对党是完全不认识的，我只是以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眼光看党。我以为党就是年青有为，想认真作事的一些人的组织。他们不贪污腐化，刻苦肯干，在我内心里引起了共鸣。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事迹，那种艰苦卓绝的精神，使我十分钦佩。至于共产党人为什么有这种精神，我则没有深入考虑过。只有一些唯心论的想法：以为世界上生下来就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好人，有的是坏人。国民党主要是坏人集团，共产党主要是好人集团，如此而已。

解放以后，通过形势的教育，通过一连串伟大运动的教育，以及个人在工作岗位中的体会，才对党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认识党不光是好人集团，而且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在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领导、教育、锻炼起来的钢铁般的政治组织。党的事业就是要解放全中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要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由于我过去对党的认识不清，由于我的唯心论的思想障碍，由于我的严重个人主义思想的阻挠，虽然我曾经有几次想入党，却没有决心提出来。在解放初期我也想到，但恐怕有人说我投机，同时也怕入党以后不能再搞学术工作，我就没有提出来。参加西南土改以后，觉得自己对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的正确性有进一步的认识，也曾想提出入党的要求，但因为我对马列主义的唯物观点还有所怀疑，恐怕加入了党要讲这一方面的问题，我没有法子讲清，所以我又犹疑了。同时想到我也负责天津民盟的工作，可以作党的助手，起一些桥梁作用也是需要的，因此就没提出来。最后在“三反”、思想改造过程中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思想，批判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深刻感到自己空虚、茫然、无所依据。因此，就感到非常苦闷。经王金鼎同志的启发，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深入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唯物观点，才最后扫除了我申请入党的障碍。

我现在决心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使我能得到进一步的改造，作一个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好学生和忠实信徒，为在祖国的土地上，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到底。

1953.4.22

李叔同年谱

朱经畬

一八八〇年庚辰（光绪六年） 一岁

十月廿三日（农历九月廿日）李叔同生于天津。名文涛，又名广涛，字叔同，又号漱筒。

祖籍浙江平湖。祖父寄籍津沽，经营盐业和银钱业。父名世珍，字筱楼。筱楼有三子。嫡出长子名文锦，早年夭折。庶出次子文熙，字桐岗，又字敬甫，先天羸弱，因恐其不寿，复纳侧室王氏，即叔同生母。叔同在其兄弟中行三，出生时父年已六十八，母王氏年仅二十余。

一八八四年甲申（光绪十年） 五岁

九月廿三日（农历八月初五），父筱楼病故，卒年七十二岁。

叔同幼聪慧。是岁开始，从生母王氏习诵名诗格言。

一八八五年乙酉（光绪十一年） 六岁

从仲兄文熙（长叔同十二岁）受启蒙教育。至转年，学《百孝经》、《近性篇》、《格言连璧》等书。又读《文选》，能琅琅成诵，人多异之。

一八八七年丁亥（光绪十三年） 八岁

有王孝廉者，曾到普陀山出家，返津后居无量庵。叔同的大侄媳早寡，向王孝廉学《大悲咒》、《往生咒》等，叔同常旁听，不久也能背诵。

是年，从常云庄受业。两年间，读《孝经》、《毛诗》、《唐诗》、《千家诗》等。

一八八九年己丑（光绪十五年） 十岁

始读《四书》、《古文观止》，并临摹篆帖。此后四年间，略习训诂之学，读《尔雅》，并喜好《说文解字》。

一八九四年甲午（光绪二十年） 十五岁

读《左传》、《史记》、《汉书》等史书，并仍致力篆书，小楷。摹刘墀所临的《文徵明心经》甚久。事吟咏，有“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之句。

一八九五年乙未（光绪二十一年） 十六岁

此后两年间，从天津赵元礼（幼梅）学词。喜读五代词，尤爱王维诗。又从唐静严（一作静岩）学篆书及刻石，对金石之学，寝寝日上。兼习八股，文理清秀。结交天津艺林名士孟广慧、王吟笙、陈霭洲等，故对诗词、文章、书法、篆刻等，更有精进。

一八九七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 十八岁

叔同与俞氏结婚。俞氏家族在津经营茶叶行。

一八九八年戊戌（光緒二十四年） 十九岁

是年，清光绪采纳维新，下诏定国是。李叔同亦有“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自存”之感，赞同康梁变法，并刻“南海康君是吾师”印章以明志。其后变法失败，康梁逃往国外。叔同因受康党之嫌，乃奉母携眷，避祸上海。初赁居于上海法租界卜邻里。不久，即加入“城南文社”。

“城南文社”是上海宝山名士袁希濂、娄山诗人许幻园、儒医蔡小香、江阴书家张小楼等，本以文会友之旨，于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成立的，地点在南市青龙桥之“城南草堂”。每月会课一次，以资切磋。叔同以弱冠之年，所作诗文词赋为社之冠。书法深得汉魏六朝之秘，篆书石刻亦佳，于上海文坛，初露头角。并与袁、许、蔡、张小等。结拜金兰，号称“天涯五友”。

一八九九年己亥（光緒二十五年） 二十岁

春，迁居许幻园家的“城南草堂”。住房旁有小溪，跨溪有苍痕苍古的金洞桥，桥畔有两株两抱大的柳树，很是幽静。是年，作《二十自述诗》。

一九〇〇年庚子（光緒二十六年） 二十一岁

农历正月，作《二十自述诗序》。序为：“随地苦晚，又婴尘劳，木替草荣，驹隙一瞬，俯仰之间，岁已弱冠。回思曩事，恍如昨晨，欣戚无端，抑郁谁语。爰托毫素，取志遗踪。旅邸寒灯，光仅如豆。成之一夕，不事雕剜。言属心声，乃多哀怨。江关庾信，花鸟杜陵，为潮前贤，益增斯恶。凡属知我，庶几谅予。庚子正月。”

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陷津京。值此家国沦陷，叔同在诗文中发出“世界鱼龙混，天心何不平”的呼声。

农历九月，长子李准生。

十二月，辑所作诗为《李庐诗钟》。序文云：“素居无俚，久不托音。短檠夜明，遂多羁绪。又值变乱，家国沦陷。山邱华屋，风闻声咽，天地顿隘，啼笑胥乖。乃以余间，滥竿文社，辄取两事，纂为骈句。空梁落燕，庭草无人。隻句珍异，有愧曷哲。岁月既久，储积浸繁，覆瓿摧薪，意有未忍。用付剞劂，就正通人，技类雕虫，将毋齿冷，赐之斧削，有深企焉。庚子嘉平月。”

一九〇一年辛丑（光緒二十七年） 二十二岁

三月，叔同与常熟乌目山僧黄仰宗，上海名画家任伯年，书法家高邕之等设立“上海书画公会”，每月出书画报一张。

先后在上海的戏院粉墨登场，演出“黄天霸”、“蝴蝶庙”、“白水滩”等。因他当年在天津读书之余，兼习艺事，故能在上海演出。他在词中说这是“泥他粉墨登场地，领略那英雄器宇，秋娘情味。”他曾与著名秦腔女演员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辈，以艺事相往还，高山流水，志在赏音。后在一九〇四年甲辰所作《金缕曲》赠歌郎金娃娃的词中，抒发当时抑郁心怀：“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事，问何如声色将惜寄？休怒骂，且游戏！”又如赠名妓谢秋云诗中有句“冰蚕丝尽心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惆怅为谁颦。”亦属忧愤之作。看来，他走马章台，厮磨金粉，寄情声色，正是为了“奔走天涯无一事”而

徬徨苦闷，内心充满抑郁痛苦的表现。

这一年，叔同还将其所藏名刻与自己所刻印章，编为《李庐印谱》，并为之序。

秋，叔同奉母命入南洋公学攻读，改名成蹊，字广平，读经济特科（特班），与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人同为蔡元培门生。时蔡任总教习。学员学习，按所学的书目阅读，每日写学习札记，每月命题作文一篇，札记与作文均由蔡氏手自批改。有时召学员谈话，令自述学习心得或时事感想。劝学员习日文，蔡氏亲自教授。其教导重心在于灌输爱国思想。叔同在学习期间，受益匪浅，也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转变。

一九〇二年壬寅（光緒二十八年） 二十三岁

是年，各省补行庚子科乡试。叔同应浙江乡试，不第。仍回南洋公学继续攻读。课余之暇，并担任某报笔政。

一九〇四年甲辰（光緒三十年） 二十五岁

叔同毕业于南洋公学。与穆瑟斋等在上海市组设“沪学会”，宣传移风易俗，讲究卫生，广开风气；并提倡办学堂，培养人才，冀使国家独立富强。

农历十一月初三，次子李端生。

一九〇五年乙巳（光緒三十一年） 二十六岁

秋，叔同生母王氏逝于“城南草堂”。后来他回忆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还只四十几岁！”他还说：“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见丰子恺的《法味》）母亲故后，运灵回津安葬。他感“破碎山河谁收拾？”为求救国之道，自费东渡日本求学。^①（一说李叔同留学日本，系端方以官费派遣。见郑逸梅《南社丛谈·李叔同传》）行前填词《金缕曲》，词的下片“……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表达了他的爱国热忱。

叔同抵东京，入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欧西绘画，并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我国留日专攻艺术者，以叔同为第一人。在校成绩辄冠侪辈。

此时叔同的生活大大改变，剪去发辮，改为中分式的短发，脱去长袍马褂，改穿西装。一变而为风流潇洒的青年。

十月，与友人议创《美术杂志》，内有音乐部分，规模已具。但在十一月，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内閣文部省徇清公使要求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以为有辱国体，全体罢课，有二百余留日学生纷纷归国，同议兴办《美术杂志》的人们星散。叔同留居东京，以个人之力，先拟办《音乐小杂志》，年可二册，春秋刊行。

一九〇六年丙午（光緒三十二年） 二十七岁

正月，李叔同在东京作《音乐小杂志序》。其文曰：“闲庭春浅，疏梅半开，朝曦上

①：据载，二十世纪最初几年，中国学生的留日活动出现热潮，并且人数逐年增加，一九〇二年四至五百名，一九〇三年达一千人，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达到最高峰，人数有八千人左右。（见日人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九七〇年版十五页）

衣，软风入媚。流莺三五，隔树乱啼；乳燕一双，依人学语，上下宛转，有若互答。其音清脆，悦魄荡心。……又若登高山，临巨流，海鸟长啼，天风振袖，奔涛怒吼，更相逐搏，磅礴阖阖，谷震山鸣。懦夫丧魄而不前，壮士奋袂以兴起。呜呼！声音之道，感人深矣。唯彼声音，金出天然，若夫人为，厥有音乐。……史家所闻，实祖印度，埃及传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腊，乃有定名。……迄于今兹，发达益烈。……欧美风靡，亚东影从。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欤？乙巳十月，同议创《美术杂志》，音乐隶焉。乃规模粗具，风潮突起，同人星散，瓦解势成。不佞留滞东京，……爰以个人绵力，先刊《音乐小杂志》，饷我学界，……大雅宏达，不弃陋壤，有以启之，所深幸也。……”是年，他主编了几期，在日本印刷后，寄到上海发行。

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在日本戏剧家藤泽浅二郎的帮助下，叔同与曾孝谷、吴我尊等发起组织文艺话剧团体“春柳社”。

一九〇七年丁未（光緒三十三年） 二十八岁

春，“春柳社”在东京神田区青年会（一说在骏河台中国青年会）举行赈灾文艺会，演出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三幕。叔同以“息霜”之名，饰演主角茶花女。此次演出，开中国话剧运动的先河。

夏，叔同和欧阳予倩等参加话剧《黑奴吁天录》的演出，反对种族压迫。演出博得好评。此后，还有曾孝谷，李涛痕、吴我尊和谢抗白等和他们一起从事话剧活动。

一九一〇年庚戌（宣统二年） 三十一岁

叔同自日本学成回国，任天津的直隶模范工业学堂图画教习。

一九一一年辛亥（宣统三年） 三十二岁

袁希濂到津任法曹，和叔同欢晤。袁是叔同在上海的结拜弟兄，一九〇四年留学日本东京政法大学，后到津任法曹。袁在以后的回忆中说，叔同家在天津某国（奥国）租界，夏屋渠渠，门首有“进士第”匾额，曾饭于其家。

是年初，家庭破产，一倒于义善源票号五十余万元，再倒于源丰润票号亦数十万元。

叔同复至上海，任城东女学音乐教习。三月，加入“南社”。与柳亚子、苏曼殊等用诗文宣扬民族主义思想，提倡民族气节，以文学鼓吹革命。

十月十日（农历八月十九）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叔同极为兴奋，填词《满江红》。中有“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成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等句。对中国的未来，抱有无限希望。

一九一二年壬子（民国元年） 三十三岁

一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二月，清帝退位。三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同年春，陈其美，叶楚傖等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柳亚子等主笔政，叔同任文艺广告编辑，又主编副刊画报。与柳亚子等创办“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刊印会员所作书画印章拓本，在内部传观。六月，《太平洋报》负债停刊，“文美社”解

散，《文美杂志》停刊。

七月，叔同到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图画和音乐教师。

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四年 继续在杭州任职，配词作曲，如《忆儿时》、《早秋》、《送别》等歌词，配曲教唱：热心从事艺术教育。所著诗词，以“天津李凡息庸”的署名刊于《南社》书刊中。

老友袁希濂调任浙江法曹。再得与叔同时常聚首。

一九一五年乙卯(民国四年) 三十六岁

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图画课，时常往返杭宁之间。假日组织“宁社”，借佛寺陈列古书，字画，金石。

是年，袁世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并复辟称帝，国事日非。叔同在辛亥革命时期希望祖国昌盛的理想破灭了。他开始阅读宋元理学和道家的书，自称“欣欣道人”，也有更伤感忧时之作，如《落花》、《月》等。

一九一六年丙辰(民国五年) 三十七岁

这一年，夏丏尊从一册日本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一种体育方法，古人如释迦牟尼和耶稣，都曾断过食。叔同将这册杂志借去看，就在冬季寒假期间，独自去杭州虎跑大慈寺试验断食三星期。第一周逐渐断食至尽，第二周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周由渐渐渐增至常量。断食归来以后，李叔同自书“灵化”二字，并附注：“丙辰新嘉平，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书此奉鲜典仁弟，以为纪念。欣欣道人李叔同。”

一九一七年丁巳(民国六年) 三十八岁

春节期间，叔同未回上海，到杭州跑虎寺过年。正月初八，见理学家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别署业东破佛，释号安忍)在这里出家后，叔同目睹一切，因受居士戒。返校后，开始素食，拜佛，诵经。

一九一八年戊午(民国七年) 三十九岁

暑假期间，叔同入虎跑大慈寺削发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出家前，他将一切书籍字画衣物，分赠给朋友和学生，并将其所雕金石封于西冷印社的石壁之中，刊“印藏”两字于壁上。行前，与其最亲近的弟子丰子恺、刘质平合影留念。

叔同有妻及二子，久居天津，他决心出家，事前并未告知。其留日携归的日姬，居上海，托友寄遗。日姬求一见亦不可得，绕屋啼哭而去。

九、十月间，去嘉兴精严寺藏经阁检理藏经。

(关于叔同出家的详情，瞿月在一文中说：“民国七年，师年三十九，值暑假，语相契者曰：‘余明日入山，相聚只今夕，公等幸各自爱。’众度其意不可挽，相对法然。忽一友问曰：‘君果何所为而出家乎？’曰：‘无所为。’曰：‘忍抛骨肉耶？’曰：‘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翌日破晓，遂孑然长往矣。一校役名闻玉者送师至寺。师易缁衣后，尊闻玉门居上，边之坐。师自扫除居室，玉欲代之，不可。师自支板为床，玉欲代之亦不可。玉泣不可仰，师慰令返校，玉徘徊不忍去，迟之又久，乃痛哭而回。戊午七月十三日，师于虎跑大慈寺，礼了悟和尚为剃度师，正式落

发，法名演音，字弘一。”（姜丹书亦有文记述此事，但说受戒是在灵隐寺。）

一九二〇年庚申（民国九年） 四十一岁

大师居新城（一名新登，今属浙江富阳）贝山，借到《弘教律藏》三帙，并求得《南山戒疏》和《羯磨疏》等，开始修订南山律宗。

一九二一年辛酉（民国十年） 四十二岁

大师居温州永宁下寮（庆福寺），完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此书厘订原有戒律，制为表解，更易于领会。稿为大师楷书，后由民族工业资本家穆藕初捐七百元，委中华书局缩本影印千部，分赠各寺院，以淑僧界。

一九二四年甲子（民国十三年） 四十五岁

大师从温州到宁波，准备经南京往安徽九华山，因江浙开战，在宁波七塔寺落褫。在春晖中学任教的夏丏尊邀往白马湖春社小住。

一九二六年丙寅（民国十五年） 四十七岁

暮春，大师从温州到杭州招贤寺。丰子恺得信后，约夏丏尊同由上海去杭看望大师。

暑假，大师住上海南门灵山寺，同弘伞法师（原名程中和，二次革命时一团长）同访卡子恺。其间，重访青龙桥“城南草堂”，丰子恺随行。

大师重访“城南草堂”事，姜丹书在一文中说：“子恺随行，至则故居犹存，而主人已易，草堂改为精舍（名超尘），入则大动今昔之悲，顿向佛座五体投地，叩头如捣蒜。肃穆之容，万籁为寂；凄凉之色，四壁浸寒。我佛有灵，当亦下伤心之泪矣！既知屋已易人，乃求故主何在。心诚求，其人斯得。嗟夫苍天！畴昔慷慨好义之文坛盟主许幻园者，头已白，耳已聩，憔悴之状不忍目，而犹伏处陋室，为人幄书，藉易升斗，以维持生活。相接之下，又复大恸。久之，始破涕为笑，追述前尘，恍如痴人说梦。此情此景，陪坐之子恺亦不禁涕之沾髭也。”丰子恺在《法味》一文中，也详述此次陪同寻访“城南草堂”的经过。

老友袁希濂约张小楼和许幻园同访大师，四人摄影留念（时蔡小香已故），大师亲笔题跋其上。

大师并弘伞法师乘轮去江西庐山，参加道场。

一九二七年丁卯（民国十六年） 四十八岁

大师住杭州吴山常寂寺。春，北伐军打到杭州，大师找到军中的学生共产党员宣中华等，交谈关于保护寺院问题。三月十七日，又致函给蔡元培，提出对佛教改革的建议。

秋，大师云游上海，叶圣陶、周予同、李石岑和日人内山完造等托夏丏尊相约，摆斋宴于功德林欢迎大师。宴后又随大师会见印光法师。事后，叶圣陶有《两法师》一文，记述此次相会的经过。

与《理想中人》作者，基督徒谢颂羔相会。丰子恺有题为《缘》的文章记此事。

拟赴暹罗（今泰国）行脚。过厦门时，因故留居闽南。与性显法师相契，初居太平岩，后移小雪峰（在南安），点《南山钞记》毕，赴泉州，又至永嘉。（一说大师因病居普陀寺，又由南安小雪峰回温州。）

一九二八年戊辰（民国十七年） 四十九岁